

人类是如何抗击鼠疫的

□ 邓田田



《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是画家安·让·格罗根据1799年拿破仑东征叙利亚途中的史实创作的。

破，明朝灭亡。而明政府战败的原因，据史料证实，是因为北京城内暴发了大规模的鼠疫。一城皆病，无法抵抗。

当时的北京城，是一座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多、已经毫无反抗之力的城市。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九《甲申之变》中记载，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盗去，登陴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3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又怎么可能抵挡住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呢？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对于这一场瘟疫，《明史·五行志》记载当年情况说：“京师大疫。”路养性于第二年追记瘟疫的情况说，道：“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斂者。”崇祯时人刘尚友在《定思小纪》一文中描写了京城瘟疫的惨状：“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疹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都城里有40%—50%的患病率）。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疹瘟”即腺鼠疫之古称，盖因人感染腺鼠疫后会有淋巴结凸起的症状。

其他几条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的流行已经遍及北京周边。如在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斂者。”“疙疽”，即腺鼠疫。

昌平州的记载相同，“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疽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在保定府的雄县，“郡属大疫，雄县瘟疫甚行，人心惶畏。吊问之礼几废”。

清末鼠疫的疫源地在山西长城口外荒无人烟的草原，病菌宿主是长爪沙鼠。草原地广人稀，当地人以游牧为主，本来较少接触到啮齿类动物，但当人类大规模的主动进入这一区域时，平衡就被打破了，嘉靖时期汉族移民开始对山西长城口外的蒙古草原实施移民开垦，扰乱了当地长爪沙鼠的生态环境，人、鼠接触增多，染疫可能性增大。万历八年起，山西大同开始大规模流行鼠疫。此外，灾荒之年，灾民们有到长爪沙鼠聚集地挖取鼠穴储粮的做法，不仅有可能接触到长爪沙鼠，而且有可能带回大量穴中的疫蚤。带回的病菌传给家鼠，又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蔓延。各地鼠疫此起彼伏、疫情连绵不断。

一场鼠疫，一国皆亡。千里江山，毁于鼠穴，小小老鼠间接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晚清政府抗击鼠疫

1910年，鼠疫再次袭来，疫灾迅速蔓延了整个东三省，带走了6万多条生命。随着疫情的扩散，日、俄提出：如不能有效控制，将派出专家与军队来接管东北。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清政府当局紧急派遣学成归国的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前往哈尔滨抗击鼠疫。

通过对病死者尸体的秘密解剖，伍连德认识到这是一种极其险

恶的、通过空气飞沫而人传人的肺鼠疫。他提出，“当前扑灭瘟疫的所有努力应该集中在流动人群和居民中”，请求朝廷派出大量人力物力，做出以下五条措施。

其一，对整个东北进行封锁。1911年1月13日，清廷下令封锁山海关，任何出入山海关的人都必须有在军士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定了没被感染才可放行。

其二，严格管制铁路交通。1月14日至1月19日，陆续封停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面停运。

其三，推行口罩。伍连德设计并下令赶制了大量口罩，以阻断病菌通过呼吸道传播。伍连德后来追忆此举时说：“在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

其四，分区分管。每个区配备必需的医生、物资及警察。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每种颜色只许在本区内活动。

其五，建立“鼠疫医院”。伍连德要求当地官员提供大量房舍，作为急性患者的救治医院。他还第一个提出“疑似患者”的概念，将疑似病人也集中隔离，每日检查。此外，他还设计了细致的消毒、清理及医护人员防护措施。

由此，东北疫情很快迎来了转机。3月1日，哈尔滨首先出现了零死亡。4月23日，清政府宣布东三省的疫情已经被全部清除。

这一次，中国人成功地扑灭了这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前后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

新中国对鼠疫的大力研究与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防止鼠疫的发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79年，内蒙古鼠疫防治所科研人员刘纪等人为了研究鼠疫通过疫蚤传播的规律，在自己身上做跳蚤人体叮咬实验。据统计，1979年间，在内蒙古鼠疫防治所，共有10余名科研人员主动参与跳蚤人体叮咬实验。他们写下绝命书，自愿承担风险，裸露皮肤，让可能携带鼠疫的跳蚤自由叮咬。

1980年代中期，中国一共有像刘纪这样的数千名鼠疫研究工作者在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十大鼠疫疫源地进行科研工作。15年后，他们的工作成果被集成《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中国鼠疫传播的规律被彻底掌握，全国各地防疫工作者获得了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标准操作手册。有了这套手册，鼠疫疫情传播到鼠传鼠就会被提前隔离，并扼杀。

今天，我们对鼠疫已经有了很好的防治能力，但这并不是说，鼠疫已经完全停止了对人类的攻击。2019年底，我国成功将一场鼠疫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鼠疫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吉隆边境的清代军事遗迹

□ 黄卫来



当地藏族同胞为清军墓敬献的哈达（乡村振兴专干朗萨供图）

吉隆是西藏日喀则的一个边陲小镇，也是著名的“喜马拉雅五条沟”之吉隆沟谷底。吉隆得名，传说是在公元8世纪时，赤松德赞从印度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大师途经吉隆沟，见此地山清水秀，溪流中河水洁白如乳，溪底上卵石光洁如玉，不胜感慨，欣然命名此地为“吉隆”，藏语意为“舒适村”“欢乐村”，以表达无限赞誉之情，从此，“吉隆”之名流传至今。

虽然从吉隆沟到拉萨有近800公里的路程，且山拦水阻，但因为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在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吉隆自古以来就是西藏沟通外界的主要交通孔道。被誉为“外交家、旅行家”的王玄策曾数次从吉隆出使印度，并在这里留下“大唐天竺使出铭”碑刻和“一人灭一国”的历史传奇；尼泊尔的尺尊公主、莲花生大师、阿底峡大师等都是从吉隆入藏，书写了中尼交往的历史佳话，开拓了恢弘灿烂的佛陀之路。

当然，既然是交通要道，除了友好交往，有时战事也难以避免，在吉隆，也曾发生过数次抵御外敌入侵的战斗。最近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廓尔喀人两度入侵西藏，意图抢掠西藏遍布各地的喇嘛庙的财物，第一次以议和告终，但不甘心的廓尔喀人次年以更大规模再次入侵西藏，藏军虽顽强抵抗，但仍难以有效抗敌。于是，西藏地方政府请求清廷派兵驰援，乾隆皇帝命令大将福康安同参赞大臣海兰察率领清军支援当地藏军，并将廓尔喀人驱返喜马拉雅南麓，成功收复吉隆，甚至还反攻至廓尔喀首都。也因此，在吉隆边境，遗留下了许多与清军有关，或者传说与清军有关的人和事。

招提壁垒

“招提壁垒”石刻位于吉隆镇至吉隆县城宗嘎镇公路10多公里处东侧，距地表高约32米，字体为行书，从右至左书刻“招提壁垒”四字，每个字约50厘米见方。最初字面用红颜料描涂，形成白底红字，显得极其醒目，后因年深日久已褪色。石刻题铭被宽约5厘米的边框圈在里面，左右边框和底部边框都呈直线状，顶部边框状如中间高两边低的三段波浪，中间部分最高处向上突出呈桃尖状。在“招提壁垒”石刻的四周，还刻有藏文的六字真言遗迹和其他的一些图案。

清代有关资料曾对“招提壁垒”石刻有过记载。如清人黄沛翘撰写的《西藏图考》之《西招原图》中，在擦木卡至吉隆路线图中，便在图中的崖壁上标有“招提壁垒”题铭。该书《续审隘篇》篇中还记载：“定日西八站至济咙，计有莽噶布堆官寨、洋阿拉山、巩塘拉山、宗喀城、灵瓦昌峡、察木卡山梁、招提壁垒、邦馨，亦皆天然厄要。”说明石刻至少在清代已经存在。

从地形上看，石刻所在的山间通道是吐蕃古道上通往中尼边境的险关要道。关于“招提壁垒”，有三种解释流传：一是清代对石刻所在山峰的称呼；二是清代在此地驻军的部队番号；三是清大将领福康安打败廓尔喀人，刻字以彰显功绩。许多专家认为，石刻所在是清军反击廓尔喀人入侵取得胜利的主要道路，在这里刻字以彰显功绩的说法更容易解释。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说明“招提壁垒”石刻与乾隆时期清军联合藏军抗击外敌入侵有关。对于吉隆而言，“招提壁垒”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反击外敌入侵、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历史见证。

清军墓

清军墓同样位于吉隆镇至宗嘎镇的公路东侧，离吉隆镇5公里左右，比“招提壁垒”石刻离得更近一些。墓址在公路上方的一個二級台阶上，看上去每一座墓都和内地修建的坟墓差不多，且排列整齐。清军墓也称108塔，据说是因为总共108座石丘或者石塔。每横排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垒砌成10—12个石丘，现有12竖列。因为过去的年

代，人们还没有文物保护意识，紧邻公路一侧的第一横排，因取土破坏，现在只存石丘2个，其附近散布着明显的用来垒砌石丘的石块若干。108座是当地群众对这一遗址的口碑传说，其实当时可能更多。由于200多年来的自然风化，以及人类活动等等的破坏，有一些已经在时光的岁月里消失了。

对于这些石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当地也有不同说法。一个说法是莲花生大师从尼泊尔途经此地入藏传教布道时，见此地山水险恶，有凶邪之气，于是启动神功，在一夜之间修建了108塔，以镇邪恶，从此此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另一个更“现实主义”的说法是，福康安率领的清军在當地征战廓尔喀军队时，有不少将士战死。因为山高路远，无法将他们的遗体运回内地，于是，就把他们集中安葬在这处高地，并且以石块垒砌，留作后世纪念。

考虑到清军与藏军曾在此地联合征战入侵的廓尔喀人，战死清军墓地的说法当然更可信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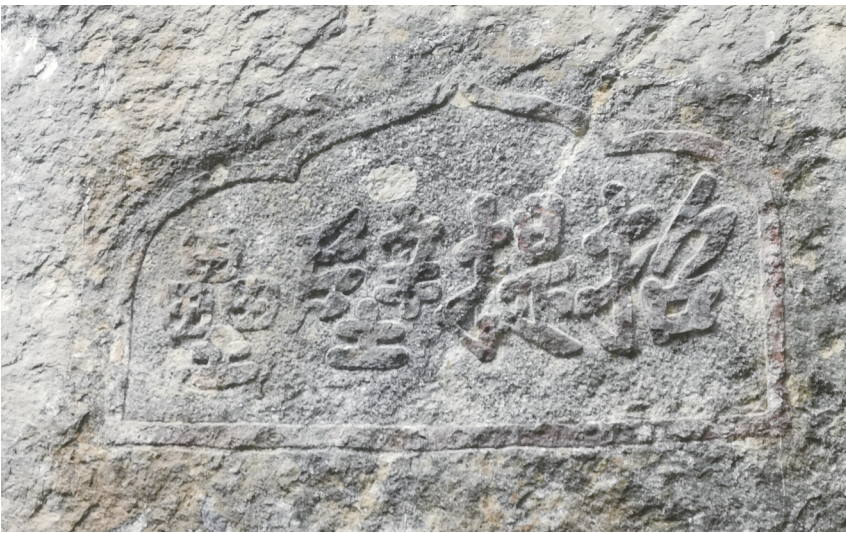
达曼村

在清军墓的北侧山下，有由几十栋排列整齐的新房构成的新村，新村靠公路一侧立着一块牌子：上书“达曼村”。村里人的五官轮廓和附近的藏族人们并不一样，尤其是眼睛，深而蓝，一看就是南亚人的模样。

他们叫达曼人，确实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来历可追溯至公元18世纪末，也就是福康安率清军抵御廓尔喀军队入侵的战斗。被福康安率领的清军打败后，一部分失散的廓尔喀骑兵留在了吉隆一带，达曼人就是廓尔喀骑兵的后代，“达曼”藏语意为“骑兵”。

在2003年以前，达曼人是一支居无定所的漂泊人群，生活贫困，主要混居于吉隆镇的萨勒、扎和、吉甫三地。因长期生活在藏族周围，达曼人的生活习俗深受藏族影响。他们在服装和语言上已经“藏化”，与藏族通常难以分辨，唯一的区分就是眼睛的蓝而深，鼻子高挺，尽管高原生活环境使肤色呈深棕色，但却怎么也掩饰不住白色人种的长相。达曼人原来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因为200多年来长期与藏族混居，他们基本都会说藏语，有的还会一点普通话，而达曼语现在会的人已经不多。

2003年5月26日，对于达曼人来说，绝对是个可以载入史册的特殊日



招提壁垒（朱文德、罗加洪供图）